

“前漢學”：十九世紀以前 德國的傳教士漢學

李雪濤*

本文以第一手西文文獻考察了19世紀以前的德國漢學（前漢學）在各個領域的發展，指出這一時期漢學研究的主體除了傳教士（如湯若望）和與傳教士有關的歐洲思想家（如萊布尼茨）以外，也包括出使中國的隨從所寫的出使報告。作為傳教士，這些漢學家有着明顯的關注範圍和研究目標，並非出自嚴格意義上的漢學興趣。這時的漢學著作大都是歐洲的作者從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出發，選取中國文化中迎合歐洲理性主義和啟蒙思想部分的結果。那些出使中國的報告以其生動的文字和講究的銅版插圖，向歐洲的智識分子描述了一幅高度發達的異域文化圖像。從研究成就上來看，這一階段的研究顯然屬於業餘愛好者水準，他們的研究題目雖然很有意思，但基本上以譯介為主，因此依然處於探索、介紹的階段。

在本文中，“前漢學”（Protosinologie）一詞係指19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在這裡主要是德國人）對中國的描述、對儒家典籍的翻譯以及對中國歷史和語言文字的探討。⁽¹⁾因為漢學作為一門學科為歐洲大學所接受和認可，是在19世紀以後的事。傅海波（Herbert Franke）認為，法國大革命爆發的1793年是“耶穌會士漢學”的終結⁽²⁾，而在19世紀“以前的一兩個世紀裡，漢學並不存在”⁽³⁾。因此，所謂的“前漢學”並非19世紀以來學術意義上的概念，它所指的更多的是早期德國人（主要是傳教士）對中國的認識。

中國對德國的早期影響

一、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前

儘管據說早在14世紀初就有方濟各會的德國修士在當時的元大都——汗八里宣講《聖經》，在這一

時期也有其他的德國傳教士來到中國，但他們對後來的德國漢學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也沒有留下任何跟中國有關的報導和著作。⁽⁴⁾對於德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真正產生影響的要算《馬可·波羅行記》德譯本的出版了。

這部敘述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在中國大陸以及蒙古帝國其它部分旅行的遊記，早在14世紀就以中古德語出版了；1477年又出版了印刷本的譯本，第一次給德國讀者留下了關於中國——這一遙遠帝國富庶、繁榮的深刻印象。⁽⁵⁾此時，令人驚歎的中華文明受到高度贊揚。⁽⁶⁾而當1499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9-1524）繞過好望角經停印度等地，帶着大量胡椒、香料再返回到里斯本後，世界歷史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在其後的幾個世紀中，大批的傳教士、商人、冒險家搭乘商船來到東亞，正是這些人將一個更真實、更直接的中國報

*李雪濤（1965年-），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導給予歐洲，從此遠東和西方的關係便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第一部具體針對中國歷史的報告出自於奧古斯丁教士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的筆下。當時被譽為“改革教宗”的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 1572-1585）支持在海外的傳教活動，特別是在日本、中國、巴西和印度地區。門多薩也正是受這位教宗之託，將歐洲有關中國歷史、政治、宗教、風俗、文字、教育的資料編纂成一部題為《中華大帝國史》的巨著。⁽⁷⁾ 該書出版四年後，德譯本便於1589年問世刊行⁽⁸⁾，並很快成為歐洲啟蒙運動中智識分子的暢銷書，為其後中國熱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儘管在當時歐洲智識界對中國的認識依然是東拼西湊的，但他們已充份意識到了中國同樣是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度。

實際上，直到16世紀晚期，僅有少數耶穌會士進入中國（羅明堅 M. Ruggieri 1580年、巴範濟 F. Pasio 1582年、利瑪竇 1583年分別入華⁽⁹⁾），因此這一時期對中國的介紹不外乎對中國的一般知識介紹，地理學和地圖學上對中國不太精確的描述，以及早期遊記中的中國。

二、耶穌會傳教士時期

天主教的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他們也是跟隨航海家的遠洋船隊踏上這個鮮為歐洲人所知的中華帝國的。傳教士們成為這之後17-19世紀中國形象在歐洲最具影響的傳播者。他們證實了，除了宗教方面之外，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同樣發達，甚至可能比歐洲文化更為發達的假設。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將這一在他眼中管理有序的帝國的哲學基礎知識傳播到了歐洲。他的《中國割記》德譯本於1617年出版⁽¹⁰⁾，在智識界影響非常巨大。然而遺憾的是，利瑪竇的作為並未能夠真正影響中國宮廷的政治生活。不過在他之後來自德國科隆的耶穌會神父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2-1666）則憑藉他優良的天文知識和軍事技術成功地進入明、清政壇，成為曾經影響中國政治的少數外國人之一。湯若望熟悉天文、曆算，並諳識

中文，在這些方面是其他西方傳教士所難及的。他的中文著作也以天文、光學、幾何等自然科學者居多，在漢學方面最有影響的是1665年在維也納出版的拉丁文著作《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主持下的中國傳教史》⁽¹¹⁾。由於湯若望親身經歷了明清之變，又在朝廷中身居要職⁽¹²⁾，因此他對這段歷史的描寫與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鞦韆戰紀》⁽¹³⁾成為後來西方漢學家瞭解明清之變的必讀書目⁽¹⁴⁾，同時也為今天我們瞭解當時的情況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當然，這一時期還有其他德國耶穌會士在中國活動，例如來自巴伐利亞的紀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 1655-1720）、戴進賢（Ignaz Kögler, 1680-1746）等等，他們在曆算、天文以及傳教學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但在漢學方面的影響則甚微。

17世紀在歐洲的兩位德國巨匠

一、萊布尼茨

真正對歐洲當時的智識界產生影響的中國文獻的譯本是《中國的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此書是由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編輯並於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此書的扉頁上所印的漢文標題為“西文四書直解”，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的拉丁文譯文。由於拉丁文在當時是一統歐洲智識界的學術語言，因此這部書的影響絕不僅僅限於法國和比利時，德國啟蒙思想家和唯理主義者萊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在同年底便讀到了這本拉丁文譯著⁽¹⁵⁾，他據此認為中國已接近了“理性化國家”這一理念。⁽¹⁶⁾ 在他看來，成熟的人類文明正處在歐亞大陸的兩端：中國文化注重實用技術，經驗總結，再配以被他稱作為“自然神學”（*Theologia naturalis*）的儒家哲學，可以說是跟有科學理論與天啟真理見長的歐洲思想、文化形成了互補。在他看來，一位在歐洲一直企盼的具有普遍慈愛之心的、公正的、有知識和智慧的政治家在中國已經出現了。而他在給歐洲人開出的藥方中，盛

贊中國的倫理道德，呼籲中國派傳教士來歐洲挽救基督教世界道德的沒落——

不管怎樣，我覺得鑒於我們目前面對的空前的道德沒落狀況，似乎有必要請中國的傳教士到歐洲給我們傳授如何應用與實踐自然神學，就像我們的傳教士向他們教授啟示神學一樣。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們借一個超人的偉大聖德，亦即基督宗教給我們的神聖饋贈而勝過他們，如果推舉一位智者來評判哪個民族最傑出，而不是評判哪個女神最美貌的話，那麼他將會把金蘋果判給中國人。⁽¹⁷⁾

萊布尼茨對中國的關注與熱情始終是他學術思想的重要方面。以與入華傳教士的通信、輾轉收集到的資料以及自己的研究為基礎，1697年萊布尼茨將他搜集到的耶穌會來華傳教士所寫的五封信以及他的前言〈致讀者〉發表，出版了著名的《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書。

萊布尼茨是將中國放入了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來看待的，並且將之作為歐洲當時現狀的參照系。由耶穌會傳教士的書信和著作所形成的以頌揚中國文明、贊揚中國倫理為基調的思潮由於萊布尼茨的《中國近事》的出版而得以登峰造極，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智識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基歇爾

真正在漢學界產生巨大影響的是比萊布尼茨稍長的生於德國富耳達(Fulda)的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0)。基氏屬於巴羅克時期最傑出的通才式學者，同時也是現代科學的開創者。他於1618年入耶穌會，之後在德國西部各地大學學習。1629年被任命為維爾茨堡(Würzburg)大學的教授。1632年由於瑞典人入侵德國，基氏被迫離開德意志。從1634年至1680年去世，他一直在羅馬作數學、物理以及東方語言的教授。他在羅馬建立了博物館，並被公認為是發明家和博學的學者。他跟他同時代的偉大人物即使沒有直接的接觸也有書信往來。

基歇爾儘管沒有到過中國，但作為衛匡國的數學老師，他與許多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如卜彌格(Michael Boym, 1612-1659)、白乃心(Johann Grüber, 1623-1680)等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這些傳教士為基歇爾提供了有關中國和遠東難得的第一手資料，也構成了基氏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拉丁文著作《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¹⁸⁾的核心部分。該書從六個方面向西方讀者介紹了有關中國的知識：1)分別從字音、字義和解讀三個方面介紹了1625年(明天啟五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2)介紹了歐洲人在中國乃至亞洲各地的旅行，特別是從馬可·波羅到白乃心、吳爾鐸(Albert d'Orville, 1622-1662)的西藏之行；3)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的儒、釋、道三種宗教；4)傳教士在中國所見到的迥異於西方的人文與自然奇觀；5)風格奇特的中國廟宇、橋樑、城牆等建築樣式；6)首次向西方人展示中國文字各種類型。⁽¹⁹⁾基氏在介紹景教進入中國的各種管道時，認為西方的偶像崇拜是經由波斯和印度傳到中國的。中國的博物知識、建築、中國的機械技術以及中國的文字也是通過上述途徑傳入西方的。法語本的結尾是由白乃心神父對意大利托斯卡納(Toscana)的大公提問所作答覆的全文。作為附錄的第324-364頁，是一部漢-法辭典。辭典的出處在書中並沒有予以說明，而這部辭典在拉丁文原文中並不存在。這兩部分正如基歇爾在〈前言〉中所交代的那樣，是從“我們的神父們”那裡得到的。辭典的內容非常新，獲得了一致的好評。因為它不僅能“幫助傳教士們用以安慰中國人的心靈”，也讓所有的智識分子乃至那些與中國發生關係的商人從中獲益匪淺。在自然科學領域基氏運用了卜彌格的《中國植物志》(Flora sinensis, Viennae Austriae: Rictius 1656)的成就，採用了這本書中的圖片，甚至將附在圖片中的漢字也一併剪貼下來加以運用。

除了深入詳細的介紹之外，書中還有百餘幅精美的銅版插圖，使得基歇爾的這部著作不僅為當時的學者所看重，也為一般的讀者所喜愛。這一里程碑式的傑作，無疑成為了推動當時歐洲“中國熱”最

重要且最有影響的撰述，出版不久就被譯成為西方的多種文字。

18世紀的兩部耶穌會士著作的德譯本

一、《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入華傳教士有關中國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儘管利瑪竇、衛匡國等人的撰述在西方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但在西方真正產生廣泛、持久影響的乃是從1708年開始編印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²⁰⁾ 因為耶穌會傳教士深入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和方面，他們以第一手資料對當時的中國進行了全方位的報導，從政治、經濟、文化，到宗教、倫理、風俗、物產，無論其深度還是廣度，都超過了以前的任何有關中國的著作，被西方當代學者認為是“西方漢學三大名著”之一。⁽²¹⁾ 此書後來由德國耶穌會士施多克蘭(Joseph Stöcklein)譯成德文，題為“以耶穌會傳教士的書信報導而展現的新世界”⁽²⁾，於1728-1761年間在德國出版。這四十卷譯本對德國智識界對於中國的認識，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二、《中華帝國全志》

1736年由法國耶穌會士赫哈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843)編寫的《中華帝國全志》一書⁽²³⁾，同樣是一部在書齋裡編撰的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赫哈德實際上是將17世紀以來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的報告、書信編輯整理而成書的。這部著作很快便成為當時歐洲人認識中國的一部大式手冊，並在幾十年之內先後被譯成了英文(1736, 1738, 1741)、德文(1747-1756)⁽²⁴⁾以及俄文(1774)等多種西方文字。德文版中也包括了一些新材料，如：耶穌會和方濟各會就禮儀之爭所進行的論爭；耶穌會士傅聖澤(Jean F. Fouquet, 1663-1740)就中國傳教情況一事所做的報告；中國文學；關於中國地理和歷史的一些說明；凱慕夫爾(Engelbert Kaempfer)所寫的日本國志⁽²⁵⁾，其中的銅版圖一再為當時和後來的書籍所翻印，幾乎成為18世紀下半葉歐洲瞭解中國的最重要的源泉。

米勒、門采爾——17世紀德國的漢語語言、文字研究的先驅

17世紀德國大部分處於普魯士的統治之下，當時勃蘭登堡選帝侯菲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 1640-1688年在位)實際控制着整個普魯士。在當時影響荷蘭、法國等地皇家貴族的“中國風”越刮越熱的時候，這位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極力以法國為榜樣的威廉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運來了很多稀有的中文書籍。這些珍本自1665年入藏柏林普魯士皇家圖書館之後，至18世紀初圖書館已經收藏有四百餘冊線裝的中國典籍。這樣，在菲德烈一世於1701年加冕普魯士國王的時候，柏林實際上擁有歐洲大陸最大的中文圖書館。

耶穌會士們有關中國的報告引起當時很多德國智識分子對這個東方文明過度的興趣和嚮往，但真正由興趣出發而對中國進行深入研究的卻寥寥無幾，其中就有曾受威廉委託收集有關中國書籍與報導並將其編成目錄的米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²⁶⁾

一、米勒

出生於格萊芬哈根(Greifenhagen)的米勒，曾在羅斯托克(Rostock)等地學習古典語言和神學。有十年時間他曾幫助英國劍橋的一位阿拉伯語專家編輯一套通用辭典。後來他為漢字所迷，回德國後為選帝侯編寫了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徵得的三百多卷中文圖書的目錄。⁽²⁷⁾ 米勒曾宣稱他已經找到了在短時間內可以掌握中國文字的鑰匙(*Clavis Sinica*)，祇是一直秘而不宣，最終竟將多年心血付之一炬⁽²⁸⁾，這件事引起了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中的惋惜。萊布尼茨曾於1679年輾轉寫信給米勒，提出了十四個有關漢字的具體問題。可惜米勒並沒有正面予以回答。⁽²⁹⁾ 究竟米勒有無發現掌握漢字的“鑰匙”不得而知，但他所留下的著作中除了上述目錄之外，還有中國歷史⁽³⁰⁾、帝王列傳⁽³¹⁾、明代地名辭典⁽³²⁾等“專業漢學”方面的工具書，還編寫了第一部《漢滿語言手冊》⁽³³⁾，米勒的這些努力為漢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門采爾

米勒去世後，另一位對中國文字也很感興趣的德國學者門采爾（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³⁴⁾ 接管了米氏在圖書館的工作，管理着選帝侯所收藏的豐富的中文圖書，他在這個位置上直到1701年去世為止。門采爾同樣宣佈他也發現了中國文字的秘訣。他於1685年出版了《拉丁文-漢字小辭典》（*Sylloge minutiarum lexicum latino-sinico-characteristici*. Nuremberg, 1685）。在這本小辭典的前言中，門氏稱實際上在華的傳教士比他更有理由編纂一部這樣的辭典，祇是由於他們有更重要的任務去完成，他才當仁不讓從事這項工作。這部辭典主要是依據梅膺祚（字誕生）編於1615年的《字彙》一書。這部在明代非常流行的字書，按楷書的筆劃，將《說文》、《玉篇》等的部首合併為214個，分為12集，收字33,179個。在門氏字典的第一部分，他指出了每一個漢字的結構、書寫方式、意義以及發音。其後的部分是按照拉丁詞的字母順序排列的：拉丁辭彙後是用葡語的形式標出的漢字的發音，最後是書寫得非常清楚的漢字。今天看來，大部分漢字的釋文是正確的，但也有一些錯誤。門氏儘管沒有指出他的辭典出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參考過基歇爾的《中國圖志》中卜彌格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碑文譯文，及書後所附的漢-法辭典。

門采爾還於1696年出版了一百四十五頁的《簡明中國紀年》（*Kurtze chinesishe Chronologia*, Berlin 1696）一書。門氏這部著作是以柏應理的《中華帝國歷史年表》⁽³⁵⁾ 為藍本，增加內容編纂而成的。柏應理神父曾一度是門氏的老師，在柏氏回歐洲的日子裡，他們之間一直有書信往來。在東亞學術在歐洲傳播方面，門采爾的貢獻絕不僅僅局限於某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院院士，他跟當時許多著名的和東亞有關的科學家都有書信往來。他本人對中國的植物學、中醫都頗有研究。同時他的著作中的各類精美的銅版畫，也都非常直觀地向歐洲智識界介紹了有關中國的各類知識。

巴伊爾、魏繼晉——18世紀兩位語言學家

一、巴伊爾

17世紀德國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關注和研究主要建立在猜測的基礎之上，當時缺乏必要的文獻資料。18世紀的狀況已經有了很大改善。出生於東普魯士科尼斯堡（Königsberg）的巴伊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早年便到了柏林皇家圖書館，讀到了門采爾留下來的各種手稿，之後由於在聖彼德堡找到了職位，他成為俄國科學院院士。巴伊爾與當時法國的學者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被認為是當時歐洲最偉大的漢學家。巴伊爾的《中文博覽》（*Museum sinicum*, Petropoli: Academiae imperatoriae 1730）一書出版於1730年，這是一本有關漢語的手冊。在序言中巴伊爾總結了至1730年以來的歐洲漢學史，着重介紹他的兩個德國前輩米勒和門采爾在漢語和漢字方面的研究成就。在本書第一卷他主要介紹漢語和文學。有關中文文法，他所依據的是衛匡國和柏應理的文法書。巴伊爾在解釋中文文法時照搬拉丁文體系，不僅對詞類進行了劃分，還給出了所謂動詞、名詞的變位、變格表。文學方面的內容也主要是依據柏應理寫給門采爾的有關中國文學的詳細書信編纂而成。巴伊爾特別舉了《詩經》中的例子說明了中國詩歌簡明扼要的特點。第二卷收錄有巴伊爾編輯的一本中文字典以及他選編的一些中文讀物。⁽³⁶⁾ 儘管《中文博覽》一書依然是東拼西湊，但由於方法的進步、資料的完善，巴伊爾的這部著作還是“開創了俄國漢語語言研究的一個偉大傳統”⁽³⁷⁾。此外，巴伊爾還整理了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有關滿語語法的著作：*Grammaticae Mungalicae pars prima*。⁽³⁸⁾ 後來德國和俄國學者在滿學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可以說巴伊爾起到了先驅者的作用。

二、魏繼晉

在來華耶穌會傳教士中來自上西里西亞（Oberschlesien）的魏繼晉（字善修，Florian Bahr, 1706-1771），對語言頗有天賦，來華不久便能熟練

運用滿、漢兩種語言佈道傳教。1758年在德國出版了他的書信集《中國最新的奇異事》(*Allerneueste chinesische Merkwürdigkeiten, Augsburg und Innsbrugg: Joseph Wolff 1758*)。⁽³⁹⁾他對德國漢學最大的貢獻，是於1748年在北京編寫的一份《德漢辭彙表》。這應當是在乾隆年間，居京諸神父敕撰漢、拉丁、法、意、葡、德六種語言字典中的德文部分。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載：“其稿藏北京遣使會圖書館。考狄君曾赴館檢閱，未見此本。考狄《書目》，一六二六頁。”⁽⁴⁰⁾1937年德國漢學家福華德(Walter Fuchs, 1902-1979)在北平的一家圖書館發現了這個辭彙表。有意思的是，表中二千二百個德文詞的發音是用中文漢字標出的。⁽⁴¹⁾

17世紀出使中國的報告

在早期介紹中國的書籍中，除了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的著作之外，還有那些出使中國的隨從所寫出的出使報告。這些報告都是以親身經歷寫成，再經過歐洲當時的學者、藝術家加工，配以精美的銅版插圖，使這一部分有關中國的書籍一時紙貴歐洲。這些對遙遠中國的報導，以及出使者們所講述的有關中國的傳說和歷險故事激起了當時歐洲人對於中華帝國的無限遐想。這些報告以其生動的文字和講究的插圖，向歐洲的智識分子描述出了一幅高度發達的異域文化圖像。

一、紐豪夫及其《荷蘭東印度公司出使記》

出生於今天德國北部于爾森(Uelsen, 當時屬於荷蘭)的荷蘭人紐豪夫(Johann Neuhof, 也寫作: Niuehof, Nijhov, Nijhoff 或 Nieuhoff, 1618-1672)幼年時代便有到世界各地遊歷的願望。他最初跟隨荷蘭西印度公司去過巴西，後於1653年又跟隨東印度公司去了巴達維亞(Batavia, 雅加達的舊稱)。後來他從巴達維亞參加了由爪哇的東印度公司總督麥促伊克爾(Joan Maetsuyker, 1606-1678)組織的荷蘭首次出使中國團，作為使團的總管紐豪夫主要負責一些組織工作。由於工作不是很多，他因此能比

較詳細地記錄下來東印度公司第一次出使中國的情況。《荷蘭東印度公司出使記》於1666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德文版⁽⁴²⁾，在歐洲和德語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⁴³⁾

紐豪夫自己說，出使中國的遊記使其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他的這本書是交由自己的兄弟亨德里克(Hendrik)親自督印的，可見他對這部書的重視程度。正是基於這部著作對中國詳細的敘述以及精美絕倫的銅版畫，才使得它成為當時有關中國著作的集大成者。同時，由於荷蘭跟臺灣的特殊關係，書中對荷蘭與中國以及臺灣關係的歷史描寫使它成為了一部不可或缺的專著。時至今日，紐豪夫的這部著作依然是最受收藏家歡迎且是最為著名的有關中國的著作之一。書中一百五十幅精湛的銅版插圖和地圖自18世紀以來一再被重印，並對當時歐洲的中國形象的形成產生過決定性影響。萊布尼茨在1689年草擬的一份有關“Sinica”的圖書目錄中，除了列舉的耶穌會士的著作之外，還特別提到了紐豪夫的這部著作。⁽⁴⁴⁾

二、達波爾及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清帝國或曰中華帝國大事記》

荷蘭東印度公司第二次(1662)和第三次(1664)的中國之行由達波爾(Olfert Dapper, 1635-1689)在德文版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清帝國或曰中華帝國大事記》(阿姆斯特丹, 1676)中予以了生動的描述。⁽⁴⁵⁾

荷蘭作家達波爾原本是醫生，但他對異域風情卻非常着迷，搜集到了許多各種銅版畫。達氏與當時任阿姆斯特丹的維辰(Niklaas Witsen)市長交往甚密，市長先生對達氏的收藏情有獨鍾。達波爾本人並未到過中國，這後兩次的中國之行的具體情況乃是由蒙塔努斯(A. Montanus)向他提供的。由於這兩次的出使航線跟紐豪夫所描寫的第一次的完全不同，這對當時的地理知識的擴展也是一大貢獻。作為該書附錄的《大清國志》(*Beschreibung von Taising*)實際上是一部獨立的著作，是從當時不同的有關中國的著作中摘錄而成的。至於書中無數插圖的來源，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插圖中最著名的一幅乃是幾乎家喻戶曉的午門前接受朝貢圖。在圖的前部分可以看到各式的西式貢品，其中還有一個地球儀。公使（這裡指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第三次中國之行的代表胡恩（Pieter van Hoorn）在午門外的廣場等待中國皇帝或皇帝的代表接見的情形。

三、伊德斯及其《到中國的三年旅行》

此外，多年來一直在俄國做生意的德國人伊德斯（Everard Isbrant [Ysbrants] Ides，約1660-?）⁽⁴⁶⁾於1707年在法蘭克福出版的《到中國的三年旅行》⁽⁴⁷⁾，也可算作在德國漢學史上非常有影響的出使中國的報告了。早在此書以書的形式出版前，萊布尼茨就關注到了伊德斯作為沙皇特使出使中國的事件。1693年1月中下旬，萊布尼茨在給波蘭耶穌會士、索比斯基（Jean Sobieski, 1631-1700）三世的宮廷數學家科翰斯基（Adam Kochanski, 1631-1700）的一封信中，為這位波蘭神父翻譯了伊德斯出使中國的德文報告。⁽⁴⁸⁾1697年萊布尼茨在編寫《中國近事》一書時，特別將伊德斯的〈俄國考察團在中國旅行的報告〉作為六個附件之一收入了書中。⁽⁴⁹⁾

伊德斯在俄國得到了彼得大帝的接見和信任。他曾建議沙皇，由他組織一個沙漠商隊去跟中國人做生意。建議得到沙皇批准，1692年3月伊德斯在由沙皇的軍隊護送下前往中國。實際上伊氏本人是負有特殊使命的——他受命搜集有關中國貿易的情報：俄國的何種商品適合中國的胃口以及中國的何種貨物適合俄國的需求。沙皇本人則對中國人對於1689年中俄雙方簽署的尼布楚條約的態度更為關心，他迫切地想知道中國人是否願意遵守這項條約。除了這些之外，伊德斯還要求清政府引渡投奔中國的沙皇的反對者以及要為俄國東正教團在北京尋找一塊建造教堂的地方。經過十八個月的長途跋涉，沙漠商隊終於在1693年11月來到了北京。使團不僅在商業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們從俄羅斯起程時攜帶了21,000盧布的貨物，回去時則獲得了近50,000盧布的收入；在外交上同樣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伊德斯本人曾多次獲得了康熙帝禮節隆重的接見，俄國獲得了去北京進行貿易的權利，規定

從事貿易的俄國商人每隔三年到北京一次，人數不得超過200人，到北京後被安置在俄羅斯館等。

《到中國的三年旅行》一書的描寫因為是伊德斯的親見親聞，因此彌足珍貴。書中還講述了一位在宮廷中充當皇帝翻譯的耶穌會士的故事。從伊氏描述中可以想見到當時在北京的耶穌會駐地的詳細情況。

伊德斯著作另一有價值的部分是書中的附錄：這是一份由一位姓高的中國人起草做註的《中華帝國簡述》（*Kurze Beschreibung des mächtigen Käyserthums China*）的系列文章。高氏在其中給出了中華帝國精確的歷史地理描述，其中幾章還有關於中國宗教、禮儀、風土的描寫。

前漢學時期的特點

在“前漢學”時期的大部分漢學著作大都是歐洲的作者從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出發，選取中國文化中迎合歐洲理性主義和啟蒙思想部分的結果。這些思想家對中國的研究顯然並非出自今天意義上的漢學興趣。

這一時期的傳教士漢學則不可不謂是對中國社會、歷史、語言等的深入研究，但傳教士出發點是傳播天主教（耶穌會士便認為他們的首要目的便是作“耶穌的勇兵”），他們有着明顯的關注領域和研究目標，漢學著作的翻譯和研究祇是他們傳教工作的一部分而已，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專業漢學研究”。同時也為了剛剛起步的傳教事業，傳教士們對中國的報導以頌揚中國文明、贊賞中國倫理為基調。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在向西方傳播中國的真實資訊方面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17-18世紀歐洲漢學的論題基本上都是與基督教神學或直接與《聖經》有關，例如：對中國語言的關注是建立在《聖經》記載中的原初語言基礎之上的，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則是跟大洪水的記載密切相關。正是由於在中國所發現的新現象不能融合中世紀以來在歐洲就定了型的傳統觀念，同樣也激發了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去同信仰主義作鬥爭。這一時期

有多部漢語（特別是漢字）- 歐洲語言（拉丁、德、法等）對照的雙語辭典編纂出版，客觀上也為學習漢語、認識中國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工具。

除了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的著作之外，還有那些出使中國的隨從所寫的出使報告也從另外的方面塑造了中國形象。這些以親身經歷寫成的報告，以其生動的文字和考究的銅版插圖，描繪出了一幅令當時的歐洲智識界驚歎不已的中國圖景。

而這一時期其餘的漢學研究成就今天看來顯然屬於業餘愛好者水準，他們的研究雖然很有意思，但基本上以譯介為主，並且介紹常常異常粗糙，評述又過於簡單，因此依然處在探索、介紹階段。由於沒有足夠的中文原典可資參考，譯本也僅限於傳教士所譯的儒家經典，因此在“前漢學”階段的漢學研究並沒有真正得以展開。

【註】

- (1) 而當代學者裴古安 (Andreas Pigulla) 則把時期界定在 15-18 世間，見：Andreas Pigulla: “Die Anfänge der historisch orientierten Chinawissenschaften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in Helmut Martin und Christiane Hammer (Hrg.), *Chinawissenschaften -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Hamburg, 1999, S. 117-145。中文版：裴古安：〈德語地區中國學歷史取向的起源〉，收入馬漢茂、漢雅娜、張西平、李雪濤主編：《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95-130。在此譯文中，Protosinologie 一詞被譯作“早期漢學”（頁96），實際上 proto- 來自希臘文 π ρ ο τ ο ς，具有“第一”、“首先”、“最重要的”以及“原本的”涵義。
- (2) 參考：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in August Pfitzmaier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Ostasienwissenschaften,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0. S. 23-39.
- (3) 傅海波：〈歐洲漢學史簡評〉，《國際漢學》第七輯（2002年4月，鄭州：大象出版社），頁80-93，此處引文見頁81。傅氏接着寫道：“使歐洲瞭解了中國的知識淵博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從不自認為是漢學家，儘管他們非常瞭解中國，知道中國發生了甚麼事。”出處同上。
- (4)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8, S. 4.
- (5) Marc Polo, *Il Milione. Die Wunder der Welt*. Übers. v. Elise Guignard, Zürich, Manesse, 1983.
- (6) Reinhold Jandeseck, *Das fremde China: Berichte europäischer Reisender des späten Mittelalters und der frühen Neuzeit*, Pfaffenweiler, Centaurus, 1992, S. 31-45.
- (7) 門多薩著，何高濟譯《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8) Juan Gonzáles de Mendoza, *Die Geschichte der höchst bemerkenswerten Dinge und Sitten im chinesisches Königreich des Juan Gonzales de Mendoza. Ein Beitrag zur Kulturgeschichte des ming-zeitlichen China*, hrg. v. Margareta Griessler, Sigmaringen, Thorbecke, 1992.
- (9) 分別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24、30及32。
- (10) Matteo Ricci, *Historia von Einführung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in das grosse Königreich China ...*, Köln, Hierat, 1617.
- (11) 拉丁文版：*Historica narratio de initio et progressu missionis societatis Jesu apud Chineses ac praesertim in regia Pequinensi ex litteris R. P. Joannis Adami Schall, ex eadem societate, Supremi ac regii methematun, tribunalis ibidem praesidis*. Collecta Viennae Austriae anno 1665,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i, S. C. M. aulae typographi。此書後來由曼塞克 (Sch. von Mannsegg) 譯成了德文，於1834年在維也納出版：*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ission unter der Leitung des Pater Johann Adam Schall, Priester aus der Gesellschaft Jesu*. Aus dem Lateinischen übersetzt und mit Anmerkungen begleitet von Jg. Sch. von Mannsegg, Wien, 1834.
- (12) 明末的時候由於他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而為崇禎皇帝所賞識，清兵入關以後，他一直擔任北京宮廷中的欽天監監正，並且在清廷中的這一官職一直到18世紀末都一直掌握在歐洲耶穌會士的手中。
- (13) 拉丁文版：*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tverpia 1654。德文版：*Histori von dem Tartarischen Kriege*, Amsterdam (1654)。此書有何高濟中譯本，收入安文思著，何高濟等譯《中國新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頁189-247。
- (14) 有關湯若望與明清之變的研究，見魏若望 (John W. Witek) 文：〈湯若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國際漢學》第11輯（2004年9月，鄭州：大象出版社），頁132-144。
- (15) 轉引自李文潮等編《萊布尼茨與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8。
- (16) T. Grimm, “China und das Chinabild von Leibniz”, in V. W. Bargenda & J. Blühdorn (Hrg.), *Systemprinzip und Vielheit der Wissenschaften*, Studia Leibnitiana, Sonderheft 1, Wiesbaden, 1969, p. 42.
- (17) 萊布尼茨著，梅謙立、楊保筠譯：《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6。

- (18) 拉丁文版：Athanasii Kircheri e Soc. Jesu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 auspiciis Leopoldi primi, Roman. Imper. semper augusti munificentissimi mecænatis. A solis ortu usque ad occasum laudabile nomen Domini. Amstelodami: Jan Jansson & Elizeus Weyerstraet 1666.
- (19) 見張西平〈遙望中國——簡介基歇爾的《中國圖說》〉，《傳教士漢學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295-310。
- (20) 出處同上，頁106。此書中文版(六卷)已由大象出版社(鄭州)出版，2001-2005年。
- (21) 參考張西平〈西方早期漢學的“千古不朽之作”——讀《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上揭書，頁341-345。
- (22) 德文版：Der Neüe Welt-Bott mit allerhand Nachrichten deren Missionarien soc. Jesu, Augsburg 1728-1761.
- (23) 法文版：Description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Henri Scheurleer 1736.
- (24) 德文版：Johann Baptista du Halde, Ausführliche Beschreibung des chinesisches Reichs und der grossen Tartarey. Rostock: Johann Christian Koppe 1747-1756.
- (25) 參考：Hartmut Walravens, China illustrata - 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Weinheim: Acta Humaniora, VCH 1987. S. 108-110.
- (26) 有關米勒的研究論文請參考：D. F. Lach, "The Chinese Studies of Andreas Müller",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0 (1940), 564-575.
- (27) Andreas Müller, *Catalogus librorum sinicorum Bibliothecae Electoralis Brandenburgicae*. Cölln (1683?).
- (28) 見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頁216-218。
- (29) 參考李文潮〈萊布尼茨《中國近事》的歷史與意義〉，前揭萊布尼茨著《中國近事》，頁107-108。
- (30) Andreas Müller, *Abdallæ historia sinensis*, Berlin 1677。見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頁170。
- (31) Andreas Müller, *Basilicon sinense*, O. O. u. J.。見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頁174。
- (32) Andreas Müller, *Imperii sinensis nomenclator geographicus* ... O. O. u. J.。見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頁116。
- (33) Andreas Müller: *De Sinarum magnaëque tartariae rebus commentatio alphabetica* (um 1690)。德國歌達研究及地區圖書館(Forschungs- und Landesbibliothek Gotha)藏有此書。
- (34) 有關門采爾的生平和著作見：Walter Artelt, *Christian Mentzel - Leibarzt des großen Kurfürsten, Botaniker und Sinologe*, Leipzig: Johann Ambrosius Barth Verlag, 1940.
- (35) Philippe Couplet,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æ sinicæ juxta cyclos annorum LX*. Parisiis 1686。另見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頁176。
- (36) 見 Knud Lundbaek, T. 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54, Demark, 1986, p. 108f 以及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頁214-215。
- (37) 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中國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國際漢學》第十三輯(2005年11月)頁131-163，此處引文見頁158。
- (38) 見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頁227。
- (39) 見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頁202。
- (40)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777。
- (41) W. Fuchs, "Das erste deutsch-chinesische Vokabular vom P. Florian Bahr", in *Sinica*, Sonderausgabe, 1937 I, S. 68-72.
- (42) Johann Neuhof, *Die Gesantschaft der Ost-Indischen Gesellschaft*. Amsterdam, Jacob Mörs, 1666。另請參考：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S. 142-144。
- (43) 此書的最新研究成就見：Friederike Ulrichs, *Johan Nieuhofs Blick auf China (1655-1657). Die Kupferstiche in seinem Chinabuch und ihre Wirkung auf den Verleger Jacob van Meurs*. (Sinologica Coloniensia 2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 (44) 參考：李文潮〈編年表：萊布尼茨與中國〉，前揭萊布尼茨著《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頁167。此外，在漢諾威檔案館中保存的萊布尼茨手稿中(編號：LHXXXVIII81，頁366)有一張地平風車草圖，萊布尼茨專門提到紐豪夫的這部著作。見：李文潮〈萊布尼茨《中國近事》的歷史與意義〉，引文出處同上，頁120。
- (45) Olfert Dapper, *Gedenkwürdige Verrichtung der niederländischen Ost-Indischen Gesellschaft in dem Kaiserreich Taising oder Sina*. Amsterdam, Jacob von Meurs 1676。另請參考：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S. 144-145。
- (46) 伊德斯的祖籍是荷蘭，1630年他移居到當時處於丹麥統治下的德國北部城市 Glückstadt。該市系由丹麥國王克利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於1616年建成，之後成為了著名的軍港。
- (47) Everard Isbrant Ides, *Dreyjährige Reise nach China*. Frankfurt, Thomas Fritsch 1707。另請參考：前揭 Hartmut Walravens 書，S. 147-150。
- (48) 參考：李文潮〈編年表：萊布尼茨與中國〉，前揭萊布尼茨著《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頁174-175。
- (49) 見前揭萊布尼茨著《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頁44-47。